

北京文化研究译丛

[美]Richard Belsky[白思奇]◎著

秦兰珺 李新德◎译 李新德◎校

Localities at the Center

Native Place, Space, and Power in Late Imperial Beijing



地方
在中央

晚期帝都内的

同乡会馆、空间和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文化研究译丛

[美]Richard Belsky[白思奇]◎著

秦兰珺 李新德◎译 李新德◎校

地方 在中央

晚期帝都内的
同乡会馆、空间和权力

Localities at the Center
Native Place, Space, and Power in Late Imperial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号: 01 - 2015 - 24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在中央:晚期帝都内的同乡会馆、空间和权力/(美)Richard Belsky
(白思奇)著;秦兰珺,李新德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北京文化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203 - 2931 - 6

I. ①地… II. ①R…②秦…③李… III. ①同乡会—研究—北京—
清后期 IV. ①C912.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3694 号

书名原文:Localities at the Center:Native Place,Space,and Power in Late
Imperial Beijing.

© 200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丛书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资助出版

导 言

这是一张标示为 1909 年的帝都地图（如图 1.1）^①，就让我们从这张地图说起，当时的北京正值清朝统治末期。这里的黑白显示效果欠佳，当使用彩色时，它就变得极其吸引人（参见本书末页），水路是蓝色的，官府衙门以及达官贵人的府邸是红色的，主要的寺庙则是黄色的。最初，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珍本阅览室弄来这张地图的复制品（这里的地图由该图书馆慷慨提供），这些年来，它的海报版竟成了广受欢迎的旅游产品，在整个北京城的书店和纪念品店里销售。^②

这张地图是关于“老北京”的图像——可以设想，今天那些把它当作纪念品购买的游客大概就是这么想的，而地图的包装上当然也是这么写的。但只要仔细审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张地图中的北京被描述为一个前瞻工程的核心。尽管那时清朝已经历了六十年的屈辱和灾难性动乱，并且这个王朝还有不到两年时间就要灭亡，但对此尚无意识的制图者们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想象的依旧是那个能重整河山、重整旗鼓的大清帝国。这张地图显示的远非怀旧的去，它展现的北京象征着由清王朝引领的现代化。正如其题目告诉我们的，这是“最新详细”的帝京地图。作为面向通俗大众的地图，其作图精确性无与伦比。以前的地图抹去了北京城西北和东南角的不规整，歪曲了东城墙和南城墙根的城市相对比例，对街道轮廓和城市的其他特征也复现得不那

① 《最新详细帝京舆图》。

② 《老北京胡同详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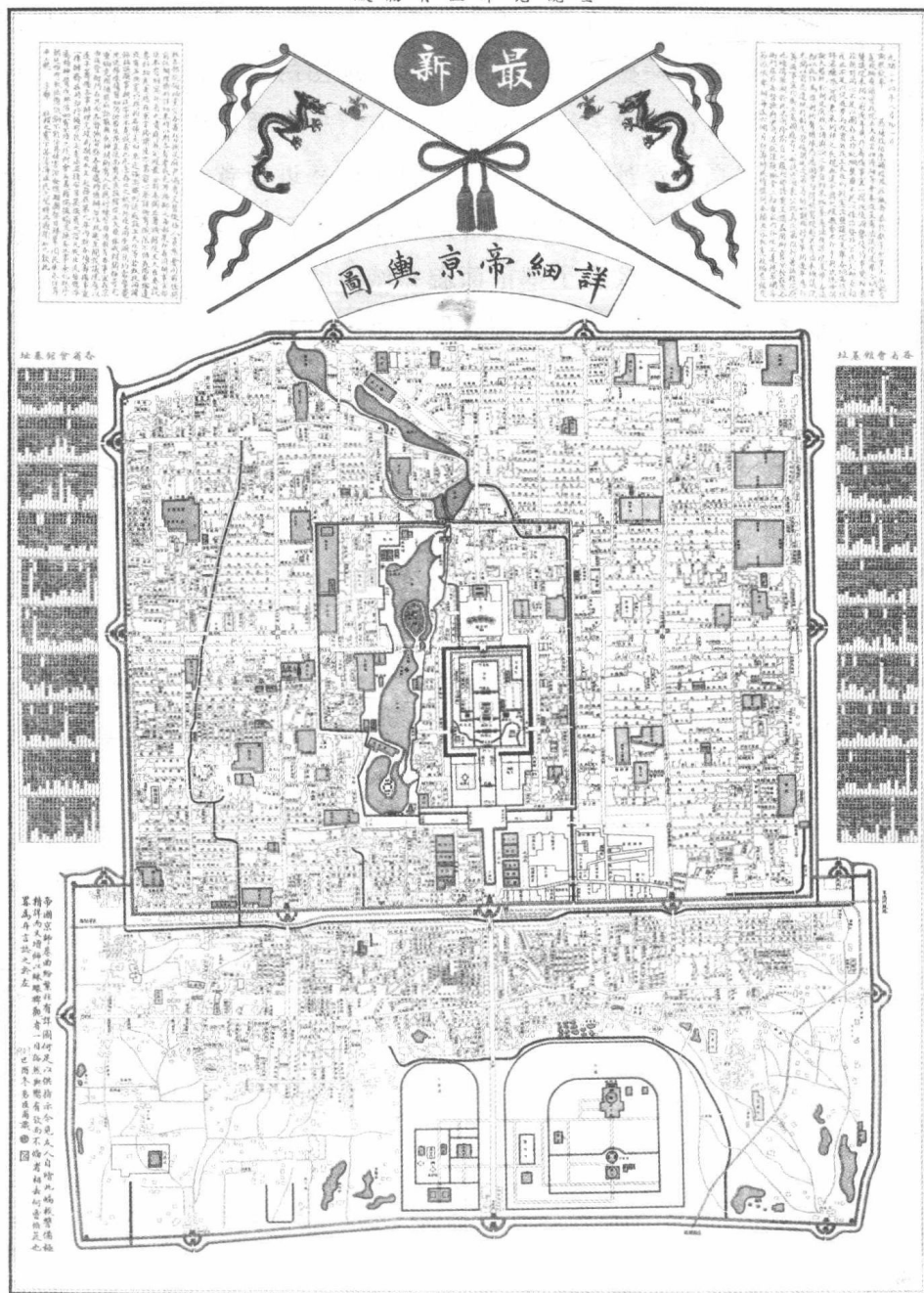
么忠实。两面交叉的旗帜位于地图的最上端，黄底龙旗是帝国的官方旗帜。^①更重要的是，龙旗旁是著名的《钦定宪法大纲》，该大纲颁布于1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在其中规划了一个复兴的、前途光明的大清王朝，并承诺一场席卷一切的政治改革，内容包括在九年之内建立立宪政府，以国会的成立为改革完成的标志。

制图者在地图东西两侧安排了两行又长又密的文本栏，内容是近400所同乡会馆的名字和街道地址，考虑到这里呈现的是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清帝京，制图者的这一用心颇能说明问题。列表占用了大量空间，这足以说明会馆在京城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虽然几百年来，同乡会馆本来就是京城的组成部分，可近几十年来，当中国的精英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调整帝国中心和边缘行省各自的职能时，同乡会馆就有了新功能。

1909年后，会馆和逐步现代化的北京之间有着引人注目的联系，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一点变得很夺人眼球，因为很快人们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认识：京城的同乡会馆和它所代表的同乡关系是中国黑暗过去的落后余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与中国在现代化方向上的努力无关；在最差的情况下，还充当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在民国时期，这样的负面呼声变得越来越大，它为共产党的后续举措铺平了道路，最终，北京的同乡会馆于20世纪50年代被官方取缔。对于正确认识同乡会馆，该观点是一副有色眼镜，这张地图让我们认识到，其实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人为产物，因此我们需要对此假设做一番重新审度。这样看来，我认为这张地图的确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将论证同乡会馆不仅在帝国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发展成为晚期帝国政治体系的重要特征，也在现代中国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讽刺的是，尽管北京的同乡会馆一度在20世纪被当作旧中国封建落后的遗留产物，但它却为塑造后来反过来取缔它的现代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① 有人认为，该旗帜本身就标志着中国致力于参与民族国家互动的现代世界秩序中，因为直到1872年，清朝根本就没有官方国旗。国旗最早为三角形，这里的长方形版本要追溯到1890年，参见 Crampton, *Flag*, 58-59。

宣统元年正月初版



此圖係由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地理學部教授白思奇君所繪，現由北京商務印書館發行。

图 1.1 详细帝京輿图

(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书作者白思奇教授提供)

什么是同乡会馆？它们为谁服务？又如何发展？它们如何融入并塑造北京的城市生态？对于晚期帝都，它们又如何促进同乡关系的多样职能？这是本书讨论的一些问题。弄明白这张地图的意义，将最终把我们引向这样一些思考：同乡关系如何充当地方行省和政治中心间的沟通渠道；利用同乡关系，帝都的旅居者们如何团结邻近行省，笼络作为整体的士人阶层；国家又如何借此维持帝都秩序，控制帝国官僚系统；与此同时，同乡关系又如何改变了都市面貌和城市的社会结构；最终，那场把大清引向覆灭的政治革新又如何重塑了以上所有功能？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本书定位	(1)
研究回顾	(2)
第二章 京城外的同乡会馆	(12)
定义会馆	(12)
有争议的出身	(18)
会馆为何于此时此地兴起	(23)
中国大地上的同乡会馆	(24)
第三章 京城士人同乡会馆的独特之处	(29)
京城会馆数量多	(29)
1949 年北京同乡会馆境况	(39)
民政局的调查	(40)
会馆种类	(42)
北京会馆客户群的历史演变	(46)
方志中的北京士人会馆	(49)
第四章 空间中的会馆	(54)
施坚雅的中国都市生态双核结构理论	(56)

明代北京的社会空间	(58)
明清之交的城市生态	(62)
宣南无再分	(67)
同乡会馆的地盘规模	(69)
第五章 作为空间的会馆	(72)
院落特征	(74)
作为文化堡垒的空间:厨房	(81)
会馆戏台	(84)
空间中的会馆和作为空间的会馆	(85)
第六章 故乡的仪式	(88)
定义 corporate	(88)
义园中的仪式	(90)
会馆院落内的仪式	(93)
会馆祀典	(100)
仪式活动与地方和帝制的认同	(101)
第七章 会馆资产的法人社团特征	(103)
会馆资产类型	(103)
资产的获得	(106)
房契以及所有权的概念	(107)
会馆寿命	(108)
会馆财政	(112)
管理	(116)
北京会馆法人社团属性之评价	(121)

第八章 政府—会馆共同维持的秩序	(124)
印结	(125)
会馆和京城的社会控制	(129)
会馆看馆	(134)
会馆司法权威的比较	(136)
会馆规章	(137)
罪与罚	(140)
第九章 央地利益在北京的联络结合	(143)
同乡关系和结识京官的非正式渠道	(146)
京官如何利用会馆协调地区利益	(148)
会馆和区域性之关系网	(152)
省级会馆的各自特色	(156)
结论	(158)
第十章 北京会馆与 19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运动	(161)
会馆与政治社团的形成	(166)
会馆空间的政治化与政府的渗透	(171)
结论	(174)
第十一章 20 世纪的北京会馆	(176)
会馆居住人口的变化	(176)
慈善活动与教育	(180)
新文化运动和对北京会馆观念的转变	(185)
民国后期不断衰败的命运	(189)
北京同乡会馆的消失	(190)

结语	(193)
跋 会馆今日	(196)
附录 明代北京同乡会馆	(207)
参考文献	(213)
中西文人名对照表	(234)
译后记	(236)

第一章 本书定位

Native-Place Lodge 在中国叫作同乡会馆。^① 以前的英语研究著作把它称作行省俱乐部 (provincial clubs)、行会 (guilds)、行省行会 (provincial guilds) 或者来自德文的 Landsmannschaften。这些称呼中最贴近同乡会馆意思的可能就是 Landsmannschaften 了, 它指的是一个类似兄弟会的机构, 其成员来自同一地区, 至少在美国, 该组织与迁徙到新世界的犹太移民密切相关。何炳棣有关该主题的汉语研究经典就选择这个术语来翻译会馆。但现在美国的欧洲移民数量锐减, 知道这个术语的人也越来越少。把一个汉语术语翻译为另一个对大多数人没有意义的术语, 无论后者多么精确, 其意义都不大, 因此, 我倾向于使用同乡会馆 (Native-Place Lodge) 这个说法。虽然很朴素, 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单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它的意思。^② 碰巧的是, 这个说法反映了京城会馆的两个显著特征: 它们提供临时住宿, 它们提供会客场所。下面的章节将展开探讨这些功能。为了多元化表达起见, 我会交替使用 Native-Place Lodge 和 huiguan 这两个说法。

① 目前, 关于中国会馆的最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依旧是何炳棣的《中国会馆史论》。其他重要著作有 (按出版先后): K., “Chinese Guilds and Their Rules”; MacGowan, “Chinese Gu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 Unions”; Morse, *The Gilds of China*; 窦季良的《同乡组织之研究》; Niida Noboru, *Chūgoku no shakai to girudo*; Negishi Tadashi, *Chūgoku no girudo*; Golas, “Early Ch'ing Guilds”; Kwang-ching Liu,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王日根的《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 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编撰的《中国会馆志》。

② Naquin 同样独立提出使用 lodge 来作为会馆的翻译, 他注意到 lodge 同时具有 (尽管并不完全) 某个机构和某处地方两个意思。参见 Naquin, *Peking: Temple and City Life, 1400 - 1900*, p. 599。

那些来自他乡并打算回到故乡的人们在所生活的城市建立了同乡会馆，而同乡会馆也为他们而建。除了住宿，会馆也是提供其他用途的场所，用来开展社交生活，进行节日庆典，谈论内部事件，讨论影响个人和地区利益的事务，和他人建立人脉关系以便推动以上利益的实现。资金雄厚的会馆装饰得富丽堂皇，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晚清帝国那些最一流的戏台。所有的会馆都配有用来举行仪式的神龛，人们在那里朝拜地方神灵、故乡先贤以及被该地区的人们以特定形式尊敬的守护神。在北京和其他行政中心，一些会馆还为科举考试的书生提供备考用的书房。还有一些则修建了典雅的景观花园，以供来自该地区的人们及其客人游览赏玩。另外一些则在底层修建了图书馆。还有很多会馆则经营着巨大的陵园和墓地，服务于客死他乡的同胞。简言之，同乡会馆是晚期帝都的重要社会机构，为大量旅居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服务项目。

研究回顾

中国的都市旅居者同其故乡间的联系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原创理论家马克斯·韦伯对此做过最早且颇具影响力的研究。^① 韦伯认为，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城市在政治、军事和组织机构上缺乏使其能够独立于帝国政府的自治，该特征阻碍了城市发展。韦伯把该状况归咎于中国的城镇居民，他们没有能力在全城范围联合成“誓约社区”或其他能够代表他们的机构，在西方，正是这些机构引领了通向城市自治的斗争。而中国城镇居民与其故土间有着紧密的血族联系和强有力的同乡关系，韦伯认为，这就是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② 正如韦伯所言：“因为有血族关系，结盟在东方比较困难。新市民一直维持着与其乡亲、故土和祖庙的关系，因此与故土乡村的一切仪式性和个体性的重要关系都完整地维系着。”^③

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城市一直以来都只是管理行为和官僚活动的中

① Weber, *Religion of China*, pp. 13 - 20; 另见 *The City*, p. 81, "Citizenship".

② Weber, *Religion of China*, pp. 13 - 20.

③ *Ibid.*, pp. 13 - 14.

心，从来没有彻底形成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城市共同体，后者的发展受到了强大离心力的作用，该离心力正来自城墙外的联系。韦伯进一步论证，只要代表着这些联系的商业会馆参与垄断，这些城外关系就会拉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后腿。^① 如果算不上公允，韦伯这个洋溢着才情的洞见可谓颇具解释力，它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被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例如，当代的亚洲城市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对传统中国城市的描述就很有韦伯的味道：

帝国权威的中心，这是传统城市的主要功能。在极具差异性的五湖四海、各种权力的象征性标志、天朝的无上威严和它所引领的中国文化中，帝国的权威都要落实其统一规划。从作用上来看，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充当的是帝国官僚机器的代理……世世代代，都市精英来自城市，同样也来自农村，但始终与其乡土故乡保持着密切联系。^②

虽然没有直接受到韦伯影响，很多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认为，过强的同乡关系阻碍了现代国族身份的形成。就连梁启超（1873—1929 年）和孙中山（1866—1925 年）这么不同的人，也都在早期纷纷提出中国人对特殊圈子的嗜好无助于他们献身于更大的（尤其是民族的、国家的）事业。但知识界也有人同为同乡关系辩护，例如，林语堂在 1935 年的一篇英语文章中就正面评价了地方意识。尽管接受了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中国人缺乏“社会头脑”，林语堂却赞扬了同乡联合，认为在同乡圈中能找到中国社会很常见的博爱情怀的起因：

地方主义，在中国文字中叫作“同乡观念”……使之共同负

^① Weber, *Religion of China*, p. 18.

^② Murphey, “City as a Mirror of Society”, 但该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参见 DeGlopper, “Social Structure in a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ese Port City”, 城镇居民和其地方出身的关系具有怎样的特征，文章对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展开了具体的反驳，尤其参见第 633 页。

责维持地方上的公立学校、公共积谷仓、同业公会、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机关。基本上，他们是从家族心理萌生出来而始终绝不离开家族的基础观念。它是家族精神的扩大，成为某数种市民合作手段的心理的原动力。^①

同乡关系究竟有何历史重要性？两部中国学者的重要著作对该问题的韦伯式论点提出了质疑，一部写于20世纪40年代，一部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两部著作同样致力于同乡关系网和会馆的研究，也都指出了韦伯模型的缺陷。窦季良的研究集中于重庆的会馆和同乡会，讨论了“乡土观念”的心理、文化、亲缘和社会起源，正是旅居者的乡土观念让他们对故乡念念不忘，乡土观念也是其同乡组织的内部黏着剂。^② 窦季良的首要关切并非同乡组织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关系。但他看到了同乡关系的潜在原子化效应，该效应将对更宏大的全城或全民族尺度上的联盟产生影响，因此，窦季良认为同乡关系具有某种倒退性，在这一点上他与韦伯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③ 但窦季良在以下观点上与韦伯大相径庭，他提出游子—故乡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同乡关系的瓦解力将随时间消逝，这恰恰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论点。窦季良也相信这样一种自然趋势：能够将全城居民联合起来的社区观念将逐渐取代畛域观念下的地方利益。^④

何炳棣在会馆问题上的研究也颇具影响力，与窦季良强调社会心理学不同，何炳棣回到了最初韦伯对经济发展的关切。^⑤ 但很明显，

①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p. 203;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五章《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八“乡属制度”。

②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1—8页。

③ 同上书，第14—16页。我们几乎对窦季良的学术训练一无所知。当时，韦伯的著作尚无英语译本，虽然窦季良很有可能读过德语原著，但他的关切更有可能针对国内。

④ 同上书，第16—20、80页。

⑤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何炳棣很可能也是在回应日本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看来，过强的地方关系是一种颇具封建性和中世纪意味的特征，但他们并没有把精力太集中在地方关系对经济发展趋势的阻碍上。部分就此问题的日本研究可参见 Imahori Seiji, *Chūgoku no shakai Kōzō*; Niida Noboru,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Guilds of Peking”; Negishi Tadashi, *Shina girudo no kenkyū and Chūgoku no girudo*。

何炳棣深受窦季良进化模型的影响。他采用并发展了该模型，使其成为反驳韦伯论断的有力武器。特别有趣的是，该著作一个重要论证的简短英文摘要与其更加微妙和详尽的中文原著比起来，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何炳棣在摘要中写道：“有研究认为，中国的地方畛域观念过于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同乡会馆就是这个情况的反映。本文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不同……具体的个案分析……揭示了同乡会馆其实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一体化的进程。”^① 这个说法在遣词造句上很讲究，其言下之意似乎是畛域观念下的同乡关系推动而非阻碍了经济的现代化（细读起来，何炳棣只对同乡会馆做出了积极评价，虽然他认为同乡关系是会馆的基础，但对此并没有直接论述）。有学者对此大做文章，认为何炳棣这是在“以中国个案的特殊性为依据，提出独立的‘理性经济行为’模型”^②。但在何炳棣眼中，会馆的积极贡献并没有那么大。在什么是经济理性的问题上，何炳棣是韦伯标准的坚定追随者，他的不同在于相信中国能够凭一己之力就达到该标准，而会馆在此历史转型中扮演的将是转变者的角色。在《会馆与地域观念的逐渐消融》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该观点更为详尽的论证。^③ 正如其标题所示，同乡关系的力量随时间而减弱，何炳棣借鉴并发展了窦季良的模型。和窦季良一样，何炳棣也看到了社会和经济理性化的无情影响，狭窄的同乡圈将在理性化塑造的这个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并逐渐汇入更宏大的居民社区：

经济与社会的力量无时不在削弱各种地缘组织原有的畛域观念。共同经济利益促成地缘的业缘组合，长期全面接触促成土客间

①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英语摘要，第4页；也可参见 Ho Ping-ti,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Kuan”, p. 122.

② 参见 Goodman, *Native Place*, p. 44。其实顾德曼这是在批评罗威廉（William Rowe）忽视了何炳棣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可我认为顾德曼自己也误读了何炳棣的论证。

③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101—114页。